

· 内部刊物 ·

西北历史资料

1982

2

(总7号)

· 内部刊物 ·

西北历史资料

1982 2 (总7号)

目 录

- 关于唐贞观九年对吐谷浑的战争.....周伟洲 (1)
- 有关回民起义的几个问题.....王宗维 (7)
- 《匈奴的文化和诺颜乌拉的墓葬》
一书的《一般结论》部分..... (苏) C.N.鲁登科 姬增录 译 (11)
- 川陕古道中的清泥路和白水路.....李之勤 (15)
- 黑城行.....胡 戟 (22)
- 唐西京乡里村考..... (日) 爱宕元 李健超 译 (26)
- 苏联的档案馆.....赵春晨 (82)
- 十九世纪前半期俄中关系史的一页..... (苏) E.B.布纳科夫 李步月 译 (85)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
一九八二年十月

关于唐贞观九年对吐谷浑的战争

周 伟 洲

一、战争的起因

自隋末以来，吐谷浑可汗伏允乘内地动乱，复故土，领有今甘南、青海及新疆若羌、且末等地，仍都青海西十五里的伏俟城。唐朝建国后，为灭掉据有甘肃河西的李轨，遣使至吐谷浑，说伏允出兵击李轨，许将其原作为隋质子的慕容顺遣还。后伏允出兵击李轨，唐高祖即将慕容顺送还吐谷浑。至此以后，吐谷浑一面不断遣使至唐朝贡，双方交往密切，并立互市；另一方面又不断攻掠唐代西部边境，阻碍中西陆路交通。其中又以后者为主。这就是唐贞观九年（635年）以前，吐谷浑与唐关系的主要特点。

据《册府元龟》卷九七〇、《新唐书》帝纪等史籍载，吐谷浑自武德二年（619年）至贞观九年，先后向唐遣使共十四次。其中武德二年二、九、十一月，三次遣使至唐，这可能与击李轨有关。特别是武德八年（625年），吐谷浑遣使请互市。唐以边界承风岭（今青海化隆南）为互市之地^①。《唐会要》卷九十四云：“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可见，双方互市对于唐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遣使、互市的同时，吐谷浑又不断攻掠唐朝沿边诸州。据《通鉴》、《册府元龟》、《新唐书》帝纪等载，从武德三年至贞观九年，短短的十五年间，吐谷浑寇扰唐边达二十一次，远远超过其遣使的次数，沿边的兰、鄯、岷、洮、旭、叠、松、芳、河、扶、凉等十一州均受其害。由于当时唐朝把主要力量放在扫灭国内群雄和对付北边的突厥，因而对吐谷浑的不断寇扰，只有采取被动的防御措施。仅在贞观八年主动遣段志玄击吐谷浑一次，但收效不大^②。这种情况到贞观九年之后，才有了根本的变化。

贞观九年，唐朝除西域及青海等地外，基本上完成了统一的大业。特别是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乘北方突厥内乱之机，一举击灭东突厥，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同时，太宗还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在国内实行了劝课农桑、轻徭薄赋、澄清吏政、减轻刑罚等一系列措施，使国内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这样，唐朝不仅有力量反击吐谷浑的寇扰，而且有了进一步向西发展，打通中西交通的需要和可能。

由于吐谷浑不断寇扰唐朝边境，沿边十一州均受其害，日益强盛的唐朝对此当然不会置之不理。这是唐朝决定派遣大军征服吐谷浑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唐朝此时急于打通中西交通，扫除障碍，将势力伸入西域，与西方交往。可是，自隋末以来，“碛路闭，故西域朝贡皆道高昌”^③，而高昌麹氏王朝与西突厥联合，“凡西域朝贡道其国，

咸见壅掠”④。而吐谷浑不仅时时寇掠河西、陇右，阻碍唐与西域的交通，甚至据有自汉代以来西域南道的要冲——鄯善、且末之地。因此，唐朝首先决定征服吐谷浑，以扫清西域交通的主要障碍。

贞观八年十一月，~~吐谷浑寇凉州~~，并拘唐行人赵德楷，唐太宗遣使者十余返，伏允仍坚持不放还。这一事件，就成为唐朝发动对吐谷浑战争的导火线。是月，太宗下《讨吐谷浑诏》，内历数吐谷浑“肆情拒命，抗衡上国”，“剽掠边鄙，略无宁息”，“上书傲狠，拘我行人”等罪行，决定派大军诛讨，“长驱尅期，穷其巢穴。罪止吐谷浑可汗昏耄之王，及天柱王一二邪臣，自余部落皆无所问。夷凶息暴，朕意焉”⑤。太宗欲以灭突厥的老将李靖为行军大总管，但又虑其年老，不胜克劳。李靖知太宗意后，主动请行。十二月，太宗以“特进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⑥，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任城郡王道宗为鄯善道行军总管，胶东郡公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行军总管⑦，利州刺史高甌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以伐吐谷浑”⑧。内各总管前所加之地名，皆为吐谷浑要地，示行军的目标。西海郡，指吐谷浑首都伏俟城一带，因隋于此设西海郡而命名。积石道、赤水道，均在隋所置河源郡内，以郡内有赤水、积石山而命名。鄯善道、且末道，以隋灭吐谷浑后所置鄯善、且末二郡命名。盐泽道，据《通鉴》卷一九四胡注云：“盐池在西海郡”，则此道系以西海盐池（今青海茶卡盐池）命名。六路总管出发地点及目标，大致是李靖、侯君集、道宗、李大亮等为一路，在鄯州集结，指向青海；高甌生为一路，从利州（治今四川广元）出发，经甘南至青海；道彦为一路，从岷州（治今甘肃岷县）出发，向赤水。此外军中还有“突厥、契苾之众”⑨，由降唐的突厥首领执失思力及契苾部首领契苾何力率领。总之，从唐朝整个军事部署来看，军队不下十万人，主要分三路指向青海，其规模之大超过了以前北魏、北周、隋代对吐谷浑的历次战争。

相反，吐谷浑自隋大业五年后，日趋衰弱，其可汗伏允此时年老昏愤，大臣天柱王弄权，国内所封诸主各据一方，势分为弱。同时，其东部一带又为北周以来兴起的党项各部所据。贞观八年前，党项纷纷降唐，使之失去了有力的同盟军。因此，无论从道义、军力、财力等方面来看，吐谷浑都是不能与唐朝相比的。

二、战争的经过及行军路线

关于贞观九年唐对吐谷浑战争的经过及行军路线，诸书记载不一。早在宋代司马光等修《通鉴》时，就已经搞不太清楚，致使这一问题被弄得越发复杂。近代以来，中外学者对此也有论述，如王谦、黄文弼、佐藤长等，但意见分歧，莫衷一是。从对两《唐书》、《通典》、《册府元龟》、《通鉴》等五种、十余处有关记载，加以分析、研究，知其中《册府元龟》卷九八五所记最详，且录自失传的《太宗实录》⑩。其余资料大都源于此，只是记述简约或理解有误，才产生了一些混乱。下面以《册府元龟》卷九八五一节为主（即《实录》，下引用不再注出处），参考它书记载，大致将这次战争的经过及行军路线勾画出一个轮廓。

九年正月，巴附唐朝的党项羌，“皆叛归吐谷浑”。

三月，洮州（治今甘肃临潭）羌族杀刺史孔长秀，附于吐谷浑。时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甌生从东面进军青海，途中破洮州叛羌^⑪。是月，李靖率大军集结于鄯州（治今青海乐都）。靖与诸将会议，讨论行军方略。侯君集主张乘吐谷浑还未避至险地，派遣精锐部队，长驱疾进，攻其不备，可大胜；否则吐谷浑潜遁远地，攻之则难。李靖采纳了他的建议。

闰四月，靖先遣道宗单师追击，去大军十日，及于库山（又名嶂山，即唐石堡城，在今青海日月山一带）^⑫。吐谷浑据山死斗，道宗暗引千骑从山后进击，吐谷浑惊溃，俘四百余人。又靖部将薛孤吴儿以轻锐追击至曼头山（今青海共和西南），“斩其名王，俘五百余人”。二十八日，李靖、侯君集等大军破吐谷浑于牛心堆（今青海湟中县东南）^⑬。时吐谷浑伏允遁逃，入大非川（今青海南惠渠）。李靖集各路军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道宗认为：“柏海（今青海鄂陵、札陵湖）近河源，古来罕有至者，贼既西走，未知的处，今假之行，实资马力。……未若且向鄯州，待马肥之后，更图进趣”^⑭。侯君集说：“不然。段志玄曩者才至鄯州，贼众便到城下，良由彼国尚完，凶徒用命。今者一败以后，斥侯亦绝，君臣相失，父子携离，乘其迫惧，取同俯拾，柏海虽遥，便可鼓行而至也”。李靖从君集建议，将大军分成两路：一由李靖率副总管薛万均、薛万彻兄弟、总管李大亮及契苾何力等由北路，出其右；一由侯君集、道宗率领，由南路，出其左。

北路军的行军路线，大致是由库山向西北，“出曼头山，逾赤水，涉青海，历河源、且末，穷其西境”。五月初，李靖等过曼头山，至赤水。按此赤水，应即《册府元龟》此段前云之“赤海”，《旧唐书》卷六十九《薛万彻传》作“赤水源”，同书卷一〇九《契苾何力传》作“赤水川”。地当在曼头山与青海之间，应即今青海恰卜恰河（古名赤水）的上源，系吐谷浑重要军事据点之一。在此，薛氏兄弟轻敌冒进，为吐谷浑大臣天柱王所围，“皆中创堕马，步斗，士死十七八”。后赖契苾何力冒围突击，天柱王败逃^⑮。李靖率大军沿青海湖南，攻占吐谷浑首都伏俟城。关于此，《新唐书》卷九十三《李靖传》及《通典》卷一五五都有明确记载。然后北路军又分军为二，李靖率军留驻伏俟城一带，而李大亮、薛万均兄弟、契苾何力则继续追击伏允于河源。按此河源，指隋所置河源郡的西部，今青海都兰以南。《唐会要》卷八十九《党项传》等云，“又有黑党项，在赤水（隋河源郡治所赤水）之西。李靖之西讨也，浑主伏允奔之，处以空闲之地。”李大亮等追击伏允至河源，应即指此。在此附近，大亮曾与吐谷浑大战于蜀浑山，“俘其名王，虏杂畜五万计”^⑯。伏允又西逃，经今柴达木盆地，至新疆的且末。于是大亮等沿此路追至且末，闻伏允逃至且末至于阗间的突伦碛（一作“突伦川”）薛氏兄弟以前赤水源之败，不敢深入。契苾何力率精骑千余骑，“直搦其牙，斩首数千级”^⑰。伏允“众消亡散，能属之者才百骑，十余日竟为其左右所杀”。五月中旬，在青海的伏允子慕容顺杀天柱王降李靖。

以上北路军从闰四月底或五月初由库山出发，沿青海湖南，经柴达木盆地，到且末南的突伦碛，行程至少在六千里以上。而史籍均记李靖平吐谷浑在五月壬子（十八日），在当时仅用骑兵的情况下，往返只用了半月左右，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正因为如此，佐藤长氏认为，李靖北路军根本没有到达新疆的且末，突伦碛也不是且末与于

阨之间的沙碛，而是在今柴达木盆地巴音河之西，德令哈以南的沙碛^⑮。这种看法，不仅与各书记载至且末一段相左，而且他没有理解北路军在攻占伏俟城前后，又分为两路的缘故。如上述，北路军攻占伏俟城后，李靖作为主帅，且年纪太大，留驻青海，五月壬子接受慕容顺之降，平吐谷浑。而李大亮等则穷追伏允于河源、且末，伏允最后为部下所杀，然后回师与李靖会合。这在《新唐书》卷九十四《薛万均传》内说得十分明白，内云万均“……追至图伦碛乃还，与靖会青海”。因此，史籍一般均以五月壬子作为平定吐谷浑的时间，至于大亮等从且末突伦碛返青海，自然时间要晚得多了。

南路军的行军路线，大致是由库山，“历破逻真谷，踰汉哭山……转战过星宿川，至于柏海。……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师，与李靖会于大非川”^⑯。破逻真谷，大致在青海东南，大非川东。从此踰汉哭山，《通鉴》卷一九四胡注：“隋志：河源郡有乌海，在汉哭山西”，则汉哭山在乌海之东。由汉哭山西至乌海。这在《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吐谷浑传》等有记载。按乌海，以前一般论著均以此乌海，即《隋书·地理志》河源郡条所记之“七乌海”。佐藤长氏引《同文志》（第992页）及国民初周希武《玉树县志稿》说，今青海东南的裕连海（又名贡嘎淖尔），周围有七川或七个湖，认为隋代的“七乌海”就是此湖。但是七乌海并不一定就是唐代史籍中所云之乌海。据《通典》卷一九〇《吐蕃》云：“其国出鄯城（今青海西宁）五百里，过乌海，入吐谷浑部落……”。按唐代一里（大里）约合今一华里多一点^⑰。照此计算，今裕连海南距西宁（鄯城）才三百多华里；而南至今喀拉海（苦海），则恰好五百多华里。因此，唐代的乌海不在今裕连海，而在喀拉海。在此，侯君集等与吐谷浑别部大战，俘名王梁屈忽^⑱。从乌海西南至星宿川，即今黄河源附近之星宿川。史籍对南路军经过此路的艰苦情况有所描述，说：“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乏水草，土糜冰，马秣雪。阅月，次星宿川，达柏海上”^⑲。柏海，《旧唐书·吐谷浑传》作“柏梁”，即今鄂陵、札陵湖^⑳。按隋代以前，均把今青海的积石山当做黄河河源，唐代才纠正了这种错误的看法，把河源置于鄂陵、札陵湖及星宿川一带，说明中国古代人民对于黄河河源的认识是不断加深的。然后，整个南路军回师至大非川，与李靖会合。

按照原来的计划，由吐谷浑东边与李靖大军会合的两路军队，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一支由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所率的唐军，自三月在洮州附近，击破叛附吐谷浑的羌人后，七月，副总管刘德敏“又击叛羌，破之”^㉑。此时，李靖早已在青海平定了吐谷浑，因此，高甑生误了与李靖会师青海的军期。战争结束后，李靖按军法处分了甑生。于是，甑生恨李靖，后来诬告李靖谋反。太宗验明系诬告，将甑生减死从边^㉒。另一支由赤水道行军总管道彦及樊兴^㉓所率的唐军，由松州出发，向西要经过党项大酋拓跋赤辞所领的地区。由于赤辞于贞观初已内附于唐，行军前唐朝又重赂赤辞，使为向导。赤辞来见唐将，说：“往者隋人击吐谷浑，我党项每资军用，而隋人无信，必见侵掠。今将军若无他心者，我当资给粮运；如或我欺，当即固险以塞军路”。后唐诸将与之歃血而盟。可是，道彦军至阔水（今四川松潘西），见党项无备，遂纵军大掠，虏牛羊数千头。党项诸羌群起反对唐军，赤辞屯野狐峡（不详），道彦不得进，为赤辞所败，死者数万人。道彦退保松州，后因此坐减死从边^㉔。樊兴也因“坐迟留不赴军期，又士卒多死，失利甲仗，以勳减死”^㉕。

尽管赤水、盐泽两路军误了军期，但在五月，李靖在青海接受了慕容顺归降之后，唐朝的胜利已成定局。

三、战争的结果、性质及意义

唐朝对于战败了的吐谷浑，将如何处置呢？他是否会像大业五年隋炀帝那样，将吐谷浑之地列为郡县、直接统治呢？唐朝的处置办法，在五月唐太宗《原吐谷浑制》中说得十分明确，内云：慕容顺能“翻然改辙，代父归罪，忠孝之美，深自可嘉。子能立功，足以补过，既往之衅，特宜原免”。又云：“然其建国西鄙，已历年代，即从废绝，情所未忍，继其宗祀，允归命胤，可封顺西平郡王，食邑四千户，仍授越胡吕乌甘豆可汗”。即是说，太宗，并没有像隋炀帝一样，将吐谷浑灭掉，以其地为郡县；而是保留了吐谷浑原有的制度和王统，由名义上的臣属变为事实上的属国。这种处置办法，从唐朝来讲，并不是因为唐太宗个人对吐谷浑发了什么善心，或者真的是因为慕容顺的归降而采取的。主要还是因为吐谷浑名义上的存在，不仅不会影响唐朝向西的发展，而且这样做，将对其它各地少数民族的归附，起到有益的影响。尽管如此，这样的处理，与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的血腥征服和残酷的掠夺，还是有一些区别，多少减轻了战争给吐谷浑人民带来的损害。

慕容顺为唐朝立为吐谷浑可汗后，不过十日即为部下所杀。这一次吐谷浑内部的动乱，一是因慕容顺本人“长自中土，早慕华风”，国人不服；二是顺本人可能在权臣们的威迫下，“遽怀二志”，因此酿成动乱。唐朝即于同年十二月，下诏权立顺子诺曷钵为主，但其部“又致扰乱，竟动干戈，各行所欲”。太宗即命侯君集率军安定吐谷浑内部。至此，唐朝的势力进一步伸入吐谷浑，次年三月立诺昌钵统其国，封之为河源郡王，仍授乌地也拔勤豆可汗^②。吐谷浑名副其实地变为唐朝的属国。

从贞观九年唐朝对吐谷浑战争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来看，这次战争的性质，最初唐朝为反击吐谷浑对其边境的不断寇扰，以及扫清中西陆路交通的阻碍，因此具有正义的性质。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写有《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其中有“李靖灭吐谷浑西海上。为吐谷浑第十”一篇，内云：

吐谷浑盛强，背西海以夸。岁侵扰我疆，退匿险且遐。帝谓神武师，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熊虎杂龙蛇。王旅千万人，衔枚默无譁。束刃踰山微，张翼纵漠沙。一举刈羶腥，尸骸积如麻。除恶务本根，况敢遗萌芽。洋洋西海水，威命穷天涯。系虏来王都，搞乐穷休嘉。登高望还师，竟野如春华。行者靡不归，亲戚讙要遮。凯旋献清庙，万国思无邪^③。虽然作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大汉族主义及为唐王朝歌功颂德的倾向，但也反映了这次战争具有正义的性质。当战争进一步入之后，唐朝统治者把正义的战争逐渐变为征服边疆少数民族的非正义的战争了。在战争结束之后，唐太宗对吐谷浑的处置较为宽大，减少了因战争带给吐谷浑人民的苦难，显示了他民族政策的一些特点。

贞观九年唐对吐谷浑的战争有着重大意义。对唐朝来讲，首先通过战争安定了西北，制止了吐谷浑对其边境的骚扰，有利于河西地区经济的发展。自贞观九年之后，唐与吐谷浑一直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吐谷浑几乎每年都遣使至唐朝贡，双方贸易往来不

绝。特别是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以族女弘化公主妻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后,两者关系更为密切。第二,唐朝的势力扩展到青海地区,使自隋代以来就划入了中国统一王朝版图的青海地区,重归于统一的多民族的唐王朝的管辖之下。李靖大军的一支,即由侯君集、道宗所率的南路军,到达了黄河河源附近的星宿川和柏海,这是中国史籍上第一次明确记载内地汉族到达黄河河源附近,纠正了隋代以前内地汉族关于河源在积石山的错误认识。第三,唐朝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之一,即扫清中西交通河西一段的阻碍。过了五年(贞观十四年),才得以出兵高昌,列其地为西州,势力伸入西域。

在这次战争中,吐谷浑虽然战败,但由于唐朝的处置得当,损失较少,且基本保存了政权,成为唐朝的属国。从此,吐谷浑与唐关系更加密切,大大促进了双方人民的友好交往,有利于双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及民族的融合。

注 释

- ① 据《通鉴》卷一九四胡注云:“宋白曰:鄯州西南至廓州广城县故承风岭,吐谷浑界,一百九十五里”。则承风岭在廓州广城县一带,时为唐与吐谷浑边界。按唐代廓州属县只有广威,而无广城,疑宋白广城系广威之误。地在今青海化隆县南。
- ②、②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吐谷浑传》。
- ③ 同上书,《焉耆传》。
- ④ 同上书,《高昌传》。
- ⑤ 《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全唐文》卷五《太宗讨吐谷浑诏》。
- ⑥ 《旧唐书》卷六十《江夏王道宗传》作“昆丘道行军大总管”。
- ⑦ 同上卷六十二《李大亮传》作“河东道行军总管”。
- ⑧ 引自《新唐书》卷二《太宗纪》。
- ⑨、⑨ 《旧唐书》卷一九八《吐谷浑传》。
- ⑩ 按《通鉴》卷一九四胡注引《考异》所用《实录》一段文字,与《册府》此段相同,故知《册府》此段系录自《太宗实录》。
- ⑪ 《新唐书》卷二《太宗纪》。
- ⑫ 详细考证见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第232—233页,昭和五十三年,岩波书店出版。
- ⑬ 按《水经注》卷二《河水》云:“湟水又东,牛心川水注之。水出西南远山,东北流径牛心堆东,又北径西平亭西,东北入湟水。”则牛心堆在牛心川东,今湟中县东南。
- ⑭、⑭ 按上引佐藤长书云,柏海,《旧唐书》作“柏梁”,唐南路军行军终点即此,地在今湟水上游,实大误。
- ⑮、⑮ 《新唐书》卷一一〇《契苾何力传》等。
- ⑯ 同上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
- ⑰ 上引佐藤长书,第240—241页。
- ⑱ 《旧唐书》卷六十九《侯君集传》。
- ⑲ 参见胡戟:《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 ⑳、㉑ 《通鉴》卷一九四,贞观九年。
- ㉒、㉒ 《新唐书》卷五七《刘文静附樊兴传》。
- ㉓ 《旧唐书》卷六十《宗室道彦传》。
- ㉔ 以上均见《唐大诏令集》卷二九等。
- ㉕ 见《柳宗元集》第1册,第22—2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附图在最后插页)

有关陕西回民起义的几个问题

王宗维

去年《历史教学》第九期发表了江地先生《太平天国时期少数民族起义词汇选释》一文（以下简称“江文”），其中关于陕西回民起义条文的解释，有许多失实之处。现就手头掌握的一些资料，提出几点意见，与江先生商榷，并求正于同志们。

陕西回民起义，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影响下爆发的一场回族农民斗争；太平军西征军入陕，又给予回民起义以积极的支持与鼓动。陕西回民起义，带动了整个西北地区的回民起义，意义十分重要。但是，对这次起义全过程的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许多重要历史事实还弄不清楚，加上回族内部的历史记载特别少，其他官私文书错误又很多，如马正和、于彦禄等被记载战死过好几次等，这对本课题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研究工作必须建立在扎实可靠的资料基础上，因此，搞清历史事实，就成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一、陕西回民起义发动的时间及其与太平天国西征军的关系

回民有一句话，“秦家是起事的根子”。当时参加过起义的回民编了许多歌谣，歌唱起义的经过，其中一首一开头就说：“此事本由秦家起，火烧秦川八百里。”可见秦家事件是起义发动的开始。

秦家即秦家滩，在华县北的渭河滩上，这里周围十个村子东连大涨村，都是回民的村庄。事件产生的经过，当时人刘东野《壬戌华州回变记》记载较详。文云：

“四月，发贼（太平军）自大峪出，渭邑（渭南）赵权中（即赵老五）曾募回勇五百，防刘峪口（在华县南，实际带领者是赵炳堃——引者），至是溃逃，沿途滋事。经圣山斫竹、瓜坡（村名）斗殴（回勇向汉民买竹，汉民父子意见不和，其父诬蔑回勇偷竹，双方发生争执。官府有“回汉械斗，鸣钟集合”的命令，顿时汉族地主武装齐集，打死回勇二人——引者），回勇赴（华）州控诉。濮公（濮尧）询其理屈，堂谕：‘向后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快头秦英，回民也，忿忿下堂，谋变益亟。汉民李发元，回民马利，出而议和，适渭邑团长张映兰、州属团长白祥生在麦地缉诛回民十七人，恶感愈深。而沿渭各村回族，纷纷挈家北渡。十八日黎明，闻有枪声。顷刻间，各团响应，集白泉堡北，近万人，搜回谍诛之。二十一日，闻发贼至墩子镇（渭南兰田交界），停和议。二十三日，濮公率团赴赤水堵御。二十五日，发贼自渭南至，濮公众寡不敌，退至小涨团……州城陷……”

另据《秦难见闻记》，太平军十九日在西安城南曲江池附近的红沟岸与官军接仗，二十一

日向兰田东走，二十二日攻克渭南，与上述时间相接。秦家滩回民在十七日以前因团练屠杀，举家北渡，十八日团练搜杀，仅得少数人，可见太平军在红沟岸打仗时，秦家滩一带的回民已经是“官逼民反”，向渭河以北集中。仓头镇又名仓渡，是渭河以北的一个集镇，与河南秦家滩一带回村隔河相望，因此，回民在此渡河以后，在仓头镇逐渐形成第一个起义据点。太平军二十二日下渭南，二十五日克华州，此时渭河以南回民大都撤至河北，所以太平军未能和起义回民部众相遇。起义回民军虽然没有能与太平军相汇合，但是，太平军连克渭南、华州二城，打击官府和地主团练武装，对回民起义是一个极大的支持与推动。于是待时而发的渭南、华县、大荔各回村大都在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间纷纷相应，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四月十七日秦家滩回民的行动，成为星星之火，迅速燃遍关中东部地区。

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咸丰元年以来陕西地区不断加深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是回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太平天国在长江流域战斗十余年，对陕西回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给予极大的影响；云南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对陕西回民具有更亲切的鼓舞。太平军西征军入陕，促进了回民起义的爆发，华州秦家滩回民被官府所迫，起来反抗，是起义的开始；太平军渭南、华州大捷，支持了陕西回民起义，把秦家滩回民起义的星星之火迅速扩大开来。

二、回民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江文说：“任武，太平天国时期西北回民起义中重要领袖，即任老五。回族，为伊斯兰教阿訇。”“洪兴，太平天国时期在西北回民起义中重要领袖。回民，陕西渭南人。胥吏出身，原为伊斯兰教阿訇……西北回民起义，以洪兴、任武和赫明堂为统帅，以渭南仓渡镇、禹家庄和大荔王阁村、乔店、羌白镇为基地，他们分兵四出，控制了渭河流域。”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有必要把当时这一带回民的情况略提几句。

自明代以来，回族在陕西关中地区发展起来，大荔、渭南、华州、临潼沿渭河两岸地区回民尤多，他们与汉族人民村落相邻，地畔连接。回族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引起汉族地主阶级的敌视；而回族经济形成较晚，敌不过历史悠久的汉族地主阶级，这种斗争从清代初年的历史记载中就开始反映出来，表现形式是地畔相争，而失败者往往是回民。所以，直到清同治年以前，陕西回族中的地主寥寥可数，势力远不如汉族地主雄厚。回族有自己的民族传统，他们的反抗性和斗争性很强，而且在斗争中容易团结在一起，这就被汉族地主阶级视为眼中钉，一些恶霸地主分子逐渐起了“灭回”之心。

《秦难见闻记》载：“先是同州所属地方见回即杀，而咸（宁）长（安）尚未如此，自官绅“格杀勿论”之告示出，于是灃桥、歪（斜）口、新丰、水沟、蓝田一带，亦如同（同州府，治大荔）属。”同州府属地方为什么要杀回民，根据大量调查资料说明，渭南孝义镇有个恶霸地主赵权中（赵老五），非常仇恨回民。有一天，他对其母说：汉民好比一斗粮，回回好比一把粮，一百个汉民杀一个回回，不愁杀不完，于是，他积极倡办团练，并任渭南一带的团练头目，拉拢亲友，在团练中散布“鸡毛传贴”，

宣传“洗回”、“灭回”。太平军进入陕西以前，在同州府属各县已经掀起了一片白色恐怖。府县地方官员在处理汉回斗争纠纷时，左汉右回，包庇汉族地主团练武装，还公开出布告支持团练的罪恶行为。太平军进入陕西后，他们又扬言回民将作太平军内应，占据陕西，以此蒙混上司。这样，团练武装杀气腾腾，回族群众惊慌不安，并把仇恨集中到团练身上。这就是回民起义军杀死陕西团练头子张芾的原因。

回民信仰伊斯兰教。当时陕西回民普遍奉行阁地木教派，一个清真寺管辖下的回民称一坊，回民的一切行动要受一坊掌教阿訇的约束，著名的阿訇象曾经在许多省担任过阿訇的学者，受到回民的特别敬仰。在“洗回”、“灭回”的白色恐怖下，各方回民都到自己的清真寺向掌教阿訇寻求出路。因此，起义初期，许多阿訇成了一坊的头目，原因就在于此。

洪兴、任武是不是阿訇，是不是回民起义的统帅呢？不是。洪兴是渭南乔店人，活动在临潼，当过牙行、棉花市场的经纪人，后来在临潼县任胥役，从来未当过阿訇。任武是渭南仓头人，从其家宅的遗址看，是中农之家，汉、回群众的反映也是如此。任武一贯经商，跑川、滇一路的生意，咸丰末年恰好在云南，据说他是同治元年春天从云南回来的。任武带回了許多有关杜文秀领导起义的消息，但他并没有参加云南起义。他回家后把云南的见闻广为宣传，远近皆知，所以张芾到油房街第一次和回民谈判，就提出要交出任武。当时任武在场，便伙同洪兴等把张芾跟到刁陵（吴陵）镇拘捕，押到仓头处死。处死张芾的时间在五月中旬，此时回民起义已经半个多月了。

如上所述，回民起义初期，一坊的掌教阿訇率领该坊的群众，绝大多数地方是如此。任武虽然不是阿訇，但威信较高，在仓头镇一带地方颇有名气，所以大家都尊重他。当时，起义群众形成几个战斗中心，大荔羌白镇，渭南仓头镇都是重要据点。回民起义军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部，但是碰到重大问题总要一起商量，在一段时间里主持这件事情的是位“十七省阿訇”（人称时阿訇）。后来，任武杀死“十七省阿訇”想夺取领导权，引起大荔回民的不满。至于洪兴，只在起义发动时起过一点积极作用，后来就后退了。江文说“任武和洪兴被推举为统帅”，是没有根据的。

任武为什么杀死“十七省阿訇”，据说是为夺权。起义开始时，几次主要的战争是“十七省阿訇”指挥，如大荔王阁，羌白之战，渭南孝义镇之战，都是手持农具的回民和汉族团练打。团练有枪有刀，又凭借坚固城堡，所以军事上处于优势；但回民人多，斗争性强，加上“十七省阿訇”指挥有方，最后胜利了。回民对这位阿訇很尊敬，象神奇的故事一样传诵他，重大问题都请他出谋划策，在羌白一带很有威望。仓头镇是又一个据点，处死张芾时的情况回民歌谣中说：“仓头镇任老五细问一遍，马彦英在宝帐就把令传”。马彦英也是渭南乔店人，看来主持军事。任武审讯完张芾，马彦英下令执行。任武指挥不了羌白一带的回民，就起杀“十七省阿訇”的念头，据说是借请来参加议事的会暗害的，因此回民对任武的行为大为不满。

任武杀害“十七省阿訇”的时间在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即胜保被清廷革职拿问“锁拿进京”、多隆阿领兵入陕镇压回民的时候。从这个时期开始，战斗非常残酷。以前回民军战斗的对象是地方官府和地主团练武装，从此以后，就要和清朝政府的精锐部队打。多隆阿入陕后驻扎同州（大荔县），采取步步为营，一个村一个村逐一清剿的办法进行

镇压，大荔回民首当其冲，羌白据点就成了前沿。羌白据点请任武支援，任武不派人前往。歌词中说：“仓头镇任老五不言不喘（传），每日里在宝帐去抽洋烟（鸦片）”。任武抽鸦片，这从他孙子的谈话中也可以证明。说禹得彦派人来仓头请任武议事，任武抽足了大烟起身，中途被禹得彦部下所杀，他的儿子逃到渭河南汉族人家隐藏，后来经周阿旬从中调停才回来，至今任、禹两家互不往来。又说，任武当时想投降，被禹得彦杀害了。看来，任武没有指挥战争的能力，在严重关头束手无策，又不能调兵支援与多隆阿战斗的回民军。反而拥兵自守，表现消极，所以被杀死了，时间在清军占领羌白前后。

赫明堂，同州赫冶家村人，阿旬出身，教名“古柏儿”人，称“赫冶古阿旬”。咸丰年间在云南掌教，十一年返回陕西，宣传云南杜文秀领导起义的经过，在同州府一带颇有威望。回民起义时，他是一个坊的头目，会指挥打仗。同治二年失败以后，退到庆阳董志原，在十八大营时期当过一营头目。后来孙义宝在固原降清，授封为“平西王”，孙义宝借马正和之手，把赫明堂杀害了。

三、关于十八大营的问题

江文中说：“任武领导回民杀死张芾，举行起义，起义军组成了十八大营。”陕西回民起义一开始就组成十八大营的说法，在其他书籍、文章中也有所见。但是，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

同州府属各县起义最早，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一开始是一坊掌教阿旬领导一方回民，所以许多地方是阿旬领导的，如阎兴春、蓝明泰、陈林、冯均富、赫明堂等阿旬即是。但是，阿旬不一定会打仗。上面举的几个是逐渐学会打仗保留下来的，不会打仗的慢慢被淘汰，而代以普通农民出身的领袖人物，他们在战争中取得了人们的拥护，逐渐成了领袖人物，如大荔的于彦禄、禹得彦，渭南的马彦英，高陵的马生彦，泾阳的杨文治、毕大才，西安的马正和、白彦虎，凤翔的崔伟等。战争越激烈，这些人物的作用也就越大。

回民起义开始时，八百里秦川，战线很长；加上汉回杂居，各地都有团练武装杀害回民，回民首先要保护自己的家眷、财产，所以各自活动在自己家乡附近，兵力是分散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在羌白、仓头抵抗多隆阿军队的激烈战斗时，西安、泾阳、凤翔也派人支援，但是，由于领导力量不集中，指挥不统一，最后被清军各个击败，这也是初期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有的书上有“十三营”“南八营”等，这与回民起义的组织毫无关系。“十三营”是王阁村周围的十三个村庄，领导人先后为陈林和于彦禄，算一支力量。这种“营”的名称较久，属于研究陕西回民来源和形成时探讨的问题，与十八大营无关。

同治二年冬，起义军在陕西失败后，陆续西撤，至三年春，先后到达庆阳董志原。回民离乡背境到达董志原以后，还是按原先的村社分住各处，如冯均富所部驻肖金镇，邹保和所部驻十社镇，马正和所部驻西峰镇寨子街，杨文治所部驻董志原，白彦虎所部驻晏西坳，共计十八个居住点，一面生产，一面准备战斗。为了便于指挥，（下转第84页）

《匈奴的文化和诺颜乌拉墓葬》一书的《一般结论》部分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个复杂现象，是由一系列互不依赖的因素决定的，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一般水平，其次是组成这个民族的民族成分，即包括在该民族之内，并具有各自文化的民族成分。该民族与具有另一种同它们多少有些近似或不同的文化的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互联系非常重要。此外，我们想要知道的民族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地理环境的条件，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评述匈奴文化时，也应注意到所有这些因素。

首要的问题是：匈奴文化是在以前什么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用考古的方法已经查明，匈奴在一世纪初和公元前五世纪中期所居住的地方，盛行的是所谓方形墓文化。不过，应该看到，对这种文化研究得还不够充分，还未准确地确定出它所普及的区域，还缺乏能十分准确地确定该文化遗迹时间的资料。

方形墓通常都伴有在整个蒙古广大地区和相毗连的华北地区所见到的所谓“鹿石”。方形墓的外表与和它们同期的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墓相似，但与和它们同时代的阿尔泰墓和较晚的匈奴墓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们与阿尔泰墓的区别是：墓中死者朝向另一种方位。陶器虽有特点，但从方形墓中发现的整个金属制品和艺术品来看，他们的文化有些与斯基泰时代阿尔泰居民的文化相近似，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和与他们同时代的米努辛斯克盆地文化相近似。

由于与匈奴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方形墓文化和与其同时代的米努辛斯克盆地文化一起都包括在那个时代从东欧到中央亚细亚所盛行的畜牧民族文化中。

根据十分有限的人类学资料判断，遗留下方形墓的民族的体型与匈奴人的体型区别是如此之大，以致不可能确定这两个民族在起源上的联系①。

头发是重要的种族诊断特征之一。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诺颜乌拉墓葬为研究匈奴人的头发提供了重要材料。当时H.B.捷列宾斯卡娅按照我的委托制了这些头发的横剖面组织切片。对这些切片的研究表明，诺颜乌拉出土的头发在作不大的单个摆动时是一样的。对这些头发和喀尔喀蒙古人、布里亚特人、朝鲜人、阿尔泰人、芬兰乌果尔人和斯拉夫人②的头发所进行的比较研究得出了如下的结果③。

朝鲜人的头发最粗，粗度与朝鲜人头发相近的是布里亚特人、喀尔喀蒙古人、阿尔泰人和诺颜乌拉人的头发。芬兰乌果尔人的头发细得多，最细的是斯拉夫人（大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头发。至于头发的形状，诺颜乌拉人的头发最直，斯拉夫人的头发最鬈曲。头发形状的指数为：诺颜乌拉人——79.7；喀尔喀蒙古人——77.7；朝鲜人——76.4；布里亚特人——75.8；阿尔泰人——75.0；芬兰乌果尔人——70.6；斯拉夫人——64.1。

因而匈奴人的头发不仅在颜色上，而且在形状上对蒙古人种来说都是典型的，无论是与芬兰乌果尔民族，或者与斯拉夫民族，都有着显著区别。有趣的是：从诺颜乌拉出土的头发显示出与斯基泰时代阿尔泰居民头发有着重要的区别。后者的头发与诺颜乌拉出土的黑色、深栗色或栗色头发不同，它鬈曲、纤细，形状的指数为64④。大概一部分米努辛斯克盆地居民——丁零人（中国史料称之为有黄色头发的人）——也有类似的头发⑤。很遗憾，我没有方形墓民族的头发。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根据中国史料报导，最初匈奴和东胡是一家。公元前三世纪和二世纪交接时前不久，即当单于冒顿打败东胡，并将其赶到乌桓山时，它们彻底分开了，此后东胡始称乌桓。然而，这两个民族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却早得多。因为他们的社会组织在上述时代已大不一样了。当乌桓是带有母权制残余的典型父权氏族社会时，在匈奴人那里我们已经看到，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分出贵族氏族，并具有复杂管理制度的部落内部已有了氏族同盟。

根据下述理由评定乌桓和匈奴的社会组织，像汉代中国史料中对它所叙述的那样，是有趣的。乌桓人带有母权制残余的社会组织大概是公元前五六世纪匈奴人所固有的。希罗多德指出，在一时期马萨格特人（里海沿岸的游牧民族——译者）也有类似组织。斯基泰人在公元前六世纪，即在剧烈的财产分化时期，已联合为部落联盟，主持部落联盟的是贵族的代表——依靠酋长会议的“巴济列夫斯”（君主，国王——译者）。在乌孙，大概还有阿尔泰的部落（月氏）也有类似的组织。根据中国史料的资料，乌孙是由最高首领昆莫（类似匈奴的单于）管理，并有多达4000—5000头马匹的马群占有者。

无疑，在我们所研究的时代，畜牧业是匈奴人的主要职业。人民生活对畜牧业的依赖达到这样的程度，牲畜的疫病往往招致大部分人民死亡。同时，对狩猎也不能估计不足。它占的比重非常大。匈奴人居住的地区与西西伯利亚、南俄罗斯的草原不同，后者不仅适宜于半游牧和游牧业，而且适宜于农业。按照气候和土壤条件，农业在匈奴居住地区当时不可能发展到在某种程度上能保证居民生活的程度。该地区在以后的两千年里也仍是畜牧业地区。此外，大多数居民大概没有能保证其一切需要的数量的牲畜。狩猎，特别是十分有组织的，将所有的居民（不分参加者的社会地位）都联合起来的围猎，是重要的补充资源。它们首先保障了普通围猎者的物质生活，富有牲畜的人不怎么需要猎物。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布里亚特人和蒙古人那样，以后围猎也没有丧失其意义。因为，如果在夏季乳制品是养畜者的主要食品，那么在秋季，特别在冬季，他主要是食肉，而宰杀足够数量的家畜来养活一家人，并非大家都能办到。

在各种不同材料的加工技术方面，在匈奴人的家庭手工业中，不容易分出他们自己生产的东西。如果用木头、犄角，一部分布作的产品毫无疑问是匈奴人制作的产品，那么对金属制品就不能很有把握地这么讲了，因为在它们之中有汉人制作的东西。陶器也是这样的。既然匈奴人的衣服是用毛皮和皮革作成的，而中国史料特别提到的只是乌桓妇女有制作毛织品的技能，我们就没有权利期望匈奴人会有多多少少发达的纺织业了。但是，他们有自己生产的不错的，很结实的布。被我姑且称之为“原始天鹅绒”的驮鞍木架的外套是匈奴人原本的制品。顺便谈一谈匈奴人的交通工具和运输工具。

根据在诺颜乌拉墓中检到的中国青铜辖来判断，匈奴人的大车大概与汉人的大车区

别不大。他们那里的笼头、可能还有鞍子，和其他与他们同时代的欧洲养马民族的一样。至于驮鞍，在诺颜拉乌墓葬中它们是首次发现，它们的结构和我们后来知道的萨彦阿尔泰山高原居民、中央亚细亚大森林里的通古斯人的一样。

据我们所知，匈奴男人的衣服——肥大的灯笼裤、男长衣、鞋——无论与斯基泰萨基人的衣服，或者与萨尔马特人的衣服，实际上都区别不大。这种样式的衣服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到现在，特别是在中央亚细亚和中亚的突厥蒙古民族中。和上述的民族一样，他们也有着尖顶帽子。从诺颜乌拉6号墓出土的那种戴在头上的，很讲究的帽子，对匈奴人来说是非常原本的。我们对之作了详细的描述。

铜棒（铜棍）和铠甲对匈奴人的装备来说是原本的。我曾提到，在发掘阿尔泰山的其中一座公元前六世纪的墓时，发现了一些木脚镣。在中国史料中提到丁零的木镣铐。同一史料把匈奴的骑兵称作甲骑。但是，类似在诺颜乌拉古墓中发现的铠甲的东西，在史籍中却被毫无根据地认为是马的额革了。

人民的艺术创作是文化的最显明的标志之一，因为它里面就像在镜子里一样，创作技巧、艺术风格和人民的思想都能反映出来。各部落和各民族之间相互的文化联系也反映在它里面。

如果从这一观点出发来评价匈奴人的艺术，可以说它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同时又与他们从其他民族那里继承，或接受的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应该指出，动物画在匈奴的艺术中占有特殊的优势，这使它们与该时期和早些时期的其他欧亚大陆畜牧民族的艺术很相近。至于动物的种类，在匈奴的艺术中基本上是当地动物群的代表和很少量的家畜。指出匈奴人也有自己怪异的动物是极其重要的。其中一部分怪异的动物可以借助阿尔泰部落的艺术与前亚的怪异动物相比较。

匈奴的造型艺术和西西伯利亚，阿尔泰的部落之间有着最紧密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匈奴人从西西伯利亚和阿尔泰山地的（斯基泰月氏）部落接受的只是那些在思想上与他们近似的艺术主题和结构。和没有用句号、逗号和括号这样一些符号强调动物体型的修辞手段一样，他们完全没有狮子像和狮身鹰头兽像。动物身上的这些符号，虽对公元前五——四世纪的一些艺术作品和南西伯利亚，其中包括阿尔泰山地、中亚细亚及部分前亚艺术作品很有代表性，但在匈奴人的动物画中却非常罕见。如果在那里也有这些符号，那它们的样子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另一方面，应该指出，在匈奴人的怪异动物画中具有画在鹿角尖上和尾巴稍上的怪兽头和一些对西西伯利亚和阿尔泰山地艺术中类似的画很有代表性的怪兽头。特别应该强调指出匈奴人的具有角和翼的狼、兽像，因为畜牧民族许多离奇的认识都与它有关。

在其明显表现出来的祭祀祖宗和宇宙的仪式中，在一系列与订立誓约和与向墓中放置剪下的指甲和头发的习俗有关的习俗中，我们发现许多与古代欧亚大陆的畜牧民族，特别是与斯基泰人，相同的东西。向墓中放置指甲和头发的习俗与某些宗教观念和存在占卦者和星相家的特殊团体有关系。

另一方面，与其他民族，首先是与中国的相互联系在匈奴人的物质文化中和艺术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根据在匈奴古城遗址发现的铧判断，非机械化的农业（如果匈奴人在某种程度上从

事过这种农业)可能是他们因袭汉人的。把米用作食品,此外用骨筷子,亦来自中国。匈奴古城遗址里中国式的半窑洞住宅说明,汉人对其住房建筑有影响。一部分最优秀的陶器看来也是汉人的。不仅上了漆的木盘,而且一部分铜器——灯台、罐子、悬挂旗子用的很艺术的旗杆顶、车辖——显然是汉人的。可以推测认为,大车的样子是因袭汉人的。特别可以看出,人们广泛地使用绸缎,显贵的人也穿汉人的衣服。中国对匈奴人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匈奴人物质文化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社会生活方面。他们按照汉人的样子造册登记居民和牲口,以便向居民征税。

匈奴文化对较高的汉人文化有影响,看来不大。为了对抗养马的半游牧民族,汉人在自己的军队中建立了骑兵。汉人的弓、箭以及弓囊和箭筒对使用弓箭的欧亚大陆骑兵射手来说是很典型的。西北半游牧民族的影响也反映在汉人的造型艺术中。其中,我指的是匈奴人对老虎、其中一件中国饕餮的原型、带翼的狼、山羊和马,此外还有对独特的《狮身鹰头兽像》——一种具有带翼的狮身和凤凰头的离奇动物——的处理。

匈奴人的文化与近东民族的文化也有联系,看来不多,要判断这种联系我们拥有的材料还极其有限。这些材料实际上归结为在诺颜乌拉墓葬中发现的一些外国的布匹。因为在那个时代,东西方之间沿着有名的丝绸之路进行着频繁的商品交换。巴克特里亚、安息国,或者小亚细亚的布匹或作为礼品,或作为战利品,通过这条道路可深入到匈奴人那里。也许希腊的布匹可以由黑海沿岸的北部,借助于斯基泰人的部落被匈奴人得到,这一推测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在南西伯利亚的古代遗物中没有希腊的东西。据我们所知,希腊产品没有流传到乌拉尔河以东。

书面和实物材料现在已使得能够完全恢复匈奴人的文化,但远非其中的一切都可以得到阐明。至今没有发现,自然也没有研究,一个比较早期的匈奴古代遗物。所以,无论匈奴文化在其形成时期的构成,或者起源,我们都将不能彻底地研究,以后的时期,即公元二世纪,匈奴时代以后的时期,用考古的方法说明得也极其不够,没有这些,匈奴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反映出来。在上述领域进行研究是最近的将来一个迫切的任务。

注 释

①И.И.戈赫曼:《外贝加尔地区方形墓的人类学资料》,载:《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汇编》,第十八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58年出版。

②上述民族的许多头发汇集品是我在进行人类学研究的许多年间收集的,这些头发的加工方法和诺颜乌拉出土的头发一样。

③测定了头发的粗度和形状。为了鉴定头发的粗度,采取的是头发横剖面的最小和最大半径。头发的形状是用一些切片的最小和最大直径的比测定的。

④С.И.鲁登科:《斯基泰时期中央阿尔泰住民的文化》,莫斯科—列宁格勒,1960年出版,第338页。

⑤Н.Я.俾丘林:《古代中亚住民史料集译》,第1,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年出版。

摘译自С.И.鲁登科著《匈奴的文化和诺颜乌拉墓葬》,莫斯科—列宁格勒,1962年出版,第110—114页

姬增录 译

川陕古道中的青泥路和白水路

李之勤

一、青泥驿、青泥岭和青泥路

唐代是我国古代邮驿交通发展的重要时期，从首都长安到全国各地主要城市，都修筑有官驿大道，设置的水陆驿站有一千六百余处之多，其中以青泥为名的主要驿站就有两处：一个在从长安向东南通往荆襄、江南以至岭南地区的大道上，距首都长安很近，因青泥城（今陕西省兰田县）而得名；一个在从长安向西南通往四川、云南的大道上，陕西与甘肃交界处的嘉嘉江上游，因附近有一座被称为青泥岭的大山而得名。

青泥岭是被称为“故道”（或称为陈仓道或散关道）的古代川陕大道上的险要地段，附近山势峻拔，又多云雨，道路特别崎岖陡峭。长期风化的青绿色页岩被雨水冲刷侵蚀，使得沿途布满青绿色的泥浆，攀越通过非常困难。青泥岭和青泥驿的得名，就如实反映了当地这种自然特点。

在穿越秦岭，沟通长安和汉中以及四川、云南的几条主要谷道，如故道、褒斜道、傿骆道、子午道、文川道和后来被称为连云栈（联系故道北段和褒斜道南段的一条新路，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宝鸡、汉中公路）的几条重要道路上，唐朝政府都曾设置过驿站。在这几条驿道中，故道的里程虽然比其他各条道路都迂曲漫长，可是由于沿途的河谷比较开阔，坡度比较平缓，居民也比较稠密众多，州、县、市镇相连，行止供应都很方便。所以论其重要性，故道远出其他各道之上，公私行旅的过往特别频繁。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唐玄宗仓猝从长安逃往四川，就是走的这条路。以后唐德宗、僖宗从汉中、四川返回长安，也都是走这条路的北段^①。作为这条官驿大道上的险要地段的青泥岭和青泥驿，因而更负盛名，成为当时文人学士吟咏的重要对象。

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蜀道难》写道：“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扞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扶膺生长歎”。“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②！这些激动人心的名句，就是形容青泥岭上的道路如何艰险难行的。正因如此，武元衡在《同洛阳诸公钱卢起居》一诗中有“暮宿青泥驿，烦君泪满襟”^③之句。其他歌咏青泥岭和青泥驿的诗句，还有元稹《青云驿》：“昔游蜀门下，有驿名青泥”，史瑜《青泥山》：“溪从沮水流嶓冢，岭接青泥入剑天”。辛长伯《军中行路难》：“危途紫盖峰，路涩青泥坂”，李嘉祐：“千峰鸟路含梅雨，五月蝉声送麦秋”^④。它们分别从地理位置、山川形势、物候特点和历史典故等各个角度，描述了青泥岭地区的各个侧面及其特点。

唐代以后文人学士歌咏青泥岭和青泥路的诗还有：北宋赵振《青泥驿》诗：“老杜休誇蜀道难，我闻天险不同山”见《甘肃通志》卷40《艺文》，李虞卿《咏青泥岭》